

性別、遷移與照顧（二）¹

文 | 韓宜臻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

前言

2022 年女學會年度研討會以「性別、空間與（不）移動」為題，探討性別、空間、移動（或是不移動）三者之間的交織性、權力關係與不平等。其中「性別、遷移與照顧（二）」專題論壇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主持，三位發表人分別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淑怡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黃宗儀教授，以及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唐文慧教授。

黃淑怡於 2011 至 2015 年間赴荷蘭攻讀性別研究博士，其擅長的研究領域為華人初代移民及荷蘭的移民政策。本次發表的〈荷蘭第一代華人移民女性與 Kraamzorg（產後照顧士）之跨文化溝通研究〉為黃淑怡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的「遺珠」，旨在探討在荷蘭的強制產後照顧服務政策下，第一代移民荷蘭的華人女性接受服務的經驗；特別是當西歐文化與華人文化對於母體的想像大相逕庭，這些「被迫」接受服務的移民女性如何與產後照顧士進行跨文化溝通。

1 本文經本場次論文發表人檢閱修訂。



黃宗儀長期關注東亞都會於資本全球化下所生的巨變，著有《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大都會的自我身分書寫》、《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等專書，近年則以「亞洲四小龍」的跨國婚姻為研究重心。繼臺港婚姻的相關研究後，黃宗儀本次發表其與獨立研究者胡俊佳合著的論文〈「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民之母職實踐〉，將研究對象轉為在韓的臺灣女性婚姻移民，觀察她們如何在韓化的密集母職規訓下，不斷協商、適應，努力融入韓國社會與家庭。

投身婦運多年的唐文慧，其學術研究始自對婦女及勞動議題的關懷，近年則多聚焦於婚姻移民女性，並著有《夫枷蓮花：十六個受暴越娘的出走》等專書。本次發表的〈混做母職：新移民女性跨國建制民族誌〉是因赴美一年的短期研究親身經驗所開展，以建制民族誌的方式，記錄其所處的

在美臺裔媽媽社群，分析這群享有經濟、文化及移動資本的女性，為何及如何在美國從事母職「工作」，並發展出「混合」的自我認同與母職實做。

本次發表的三篇論文分別以荷蘭、韓國和美國三個不同國家的臺灣／華人移民女性社群為研究對象。其共同點為，研究者皆關注在不同跨國語境下的女性／母職主體，身處超越國界的父權體制規訓下，各自面臨哪些矛盾與挑戰、發展出何種自我認同，及採取哪些因應策略。以下將先分別摘要三位發表人的核心論述，再由筆者挑選出「母職規訓」、「國族認同的矛盾」與「移民女性的生存之道」三個主題進行綜合記錄。

桂圓紅棗茶或者德國黑啤酒： 荷式產後照顧的母體規訓／ 黃淑怡

荷蘭自 2005 年起，在強制納保



黃淑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的基本健康保險（basisverzekering）中，納入了產後照顧服務。從此，居住在荷蘭的女性不論是否具有公民身分，亦不論其意願，一旦懷孕生產，便會有產後照顧士到府服務，協助產後復原與家務，並指導新手家長哺餵、照顧新生兒。藉此政策，荷蘭政府希望達成的目標包含：減低女性產後憂鬱；協助新手家長順利上手照顧新生兒；生產照顧分流，減少醫療與社會資源浪費；提昇婦女勞動參與率。

在〈荷蘭第一代華人移民女性與Kraamzorg（產後照顧士）之跨文化溝通研究〉中，黃淑怡透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法，一共蒐集了 38 位華人移民女性在荷蘭使用產後照顧服務的經驗。整體而言，受訪者對於這項

服務抱持著正面肯定的態度。然而，由於荷蘭人對於母體的想像與華人非常不同，這些新手媽媽在荷式產後照顧服務的規訓下，必須花費更多精力進行跨文化溝通。黃淑怡將其因應之道概分為三種：接受、抵抗與折衷。

例如，有一位受訪者生產後泌乳不足，照顧士建議她喝德國黑啤酒幫助泌乳，雖然在華人文化中，產後忌食生冷，但這位受訪者為了泌乳哺餵孩子，接受了照顧士的提議，灌了三瓶啤酒。另一位受訪者生產後，被照顧士要求在大雪天出門走動。對荷蘭

人來說，產後多出外走動可以幫助恢復；但對華人而言，產後是吹不得風的。該位受訪者於是生氣地拒絕，並要求撤換照顧士。還有一位來自香港的受訪者擅於「中西合璧」，照顧士要她吃水煮蛋、媽媽要她喝桂圓紅棗茶，她便吃蛋配茶，在不得罪兩方狀況下，溝通求共識。

黃淑怡認為，荷蘭產後照顧服務是由國家以其認為正確且結合私人商業保險形式，以標準化的方式強制輸送服務，實質上是一種對於母體的規訓機制、治理人口和同化外來移民的政策手

段。對此，移民女性發展出不同的應對策略，而非純然被動接受。是以黃淑怡認為移民女性在接受這套規訓時，仍然具有轉換、協商與抵抗的能動性。

成為韓國人的母親：韓化密集母職的實踐／黃宗儀

近年來，因結婚而移民韓國的臺灣女性（以下簡稱「臺妻」）人數逐年上升。過去關於婚姻移民的研究多聚焦於貧富階層差異較為明顯的婚姻關係，並以商品化跨國婚姻或區域間底層階級的社會流動作為分析框架。然而臺灣與韓國曾並列「亞洲四小龍」，又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兩國在經濟發展程度及社會文化上皆有一定的相近性，是以上述的分析框架並不適用於臺韓跨國



黃宗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婚姻。那麼，應從何種視角理解臺韓跨國婚姻？這些臺灣女性為什麼會想要嫁到韓國？當她們在韓國為人妻、為人母時，又會遇到哪些挫折與挑戰？從上述提問出發，黃宗儀與胡俊佳的〈「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民之母職實踐〉共訪談了73位臺妻，探討韓國社會對性別角色與國族認同的期待，如何影響她們的母職實踐。

在韓國的外籍配偶受到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意識形態的影響和規訓。韓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母親，而理想的母親應該為孩子付出一切、將孩子的教養放在第一順位。同時，韓國對於多文化家庭採取韓化（Koreanize）的策略，嫁到韓國的外籍配偶被期待要學會成為「韓國人的

母親」。然而，在臺妻實踐韓化密集母職的過程中，往往遭遇各種挑戰。

在私領域，許多臺妻面臨的第一道關卡便是夫家對外國人的排斥。黃宗儀指出，外籍母親身分正當性有賴於家裡的「男丁」，丈夫的支持程度很重要；也有受訪者靠著分擔家中經濟、生孩子等方式獲取婆家的認同。在公領域，臺妻的處境則更為嚴峻。從在哪些場合可以和孩子說中文，到如何融入地方媽媽社群，乃至孩子在學校被欺負了，即便韓文不好也要「硬著頭皮」去和老師溝通……。在亞裔混血兒易被貼上負面標籤的韓國，臺裔媽媽們為了讓孩子順利融入韓國社會，必須步步為營。黃宗儀笑著說，有一位受訪者帶著孩子在公園的時候，遇到對他們講中文感到好奇的

唐文慧（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韓國小孩。這位媽媽利用韓國小孩對臺灣的陌生，信口開河了一番：「我是臺灣人。臺灣有台積電耶，你不知道？你回去問你媽。臺灣在美國旁邊。」透過把臺灣化約為台積電，把臺灣的地理位置錯移到美國旁邊，這位媽媽巧妙地化解了臺灣人身為外國人、又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的雙重歧視風險。

黃宗儀發現，相對於過往的婚姻移民研究，臺妻們所遭遇的困境與東南亞配偶並無太大的差異。更甚者，在韓臺妻多半是中產階級女性，學歷高、外貌出眾、工作能力佳，然而這些優勢到了韓國卻可能無用武之地，更加深了她們的挫敗感。儘管如此，黃宗儀也指出，臺妻們在韓國高度競爭、極度強悍的社會中生存，也會進行反身思考、嘗試各種協商與溝通，或透過小規模個人行動式的實做來回應跨國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並從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能動性。

為了更好的生活：兼顧全家人的混做母職／唐文慧

2011年，唐文慧帶著孩子前往美國東岸小鎮進行短期學術研究，並因此接觸當地的臺裔媽媽社群。這群女性大多擁有令人稱羨的學歷或職業，但為什麼在移居美國後，多數成為全職的母親？唐文慧以這個臺裔媽媽社

群為田野場域，在往後的十年間，持續與這群女性們互動，一共訪談了33位媽媽，因此得以從更長期的觀點理解這些母親的生命歷程，並援引建制民族誌及跨國主義的概念，發展出〈混做母職：新移民女性跨國建制民族誌〉這篇研究。

這些女性的丈夫多為專業白領人士，平均教育程度高於她們。依遷移原因而言，她們大致可分為四類：家庭移民、跨國婚姻、陪讀媽媽與隨行妻子，多數是因為丈夫與孩子的原因而移民，呈現「性別化」遷移的現象。她們多表示，移民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所謂更好的生活，不只是自我的需要，而是要能「兼顧」個人與家庭。在與這些媽媽互動的過程中，唐文慧發覺，事實上母親們在移民歷程中，面臨許多情感矛盾的「斷裂（disjuncture）」經驗，例如：移民身份取得的不確定、是否進入就業市場的矛盾、子女教養的挑戰。但受訪者們卻以「時間」能解決一切來自自我增能淡化困難，強調尋求方法克服問題的自信與展現個人能力。唐文慧認為，這群母親在移民歷程中，憑藉人力資本與家庭資源，因而在跨國情境中展現其「性別化能動性」。

唐文慧進一步分析，在移民體制、身份認同、家庭分工與族裔社群等「跨

國交織」的「多重建制」下，這群母親們一方面積極參與當地的臺灣人社群，建立緊密的族裔網絡，一面維繫著跨國的家庭分工；她們的無償勞動與人力資本的投注，可說撐起了整個臺美移民建制的順利運作，並對臺灣與美國雙邊國家、社會與家庭都做出貢獻。在此過程中，她們發展出一種「混做」的認同，既是臺灣人，也是美國人，期待取得臺灣與美國跨國雙邊的優點，例如：雖然孩子們在美國受教育，但也必須學中文，並且與母國臺灣保持密切的互動來往。在雙邊認同之下，這群臺裔媽媽們努力實踐著「好移民」與「好媽媽」的雙重社會期待。

父權結構依然穩固：母體／母職規訓無國界

從上述三篇研究可以發現，儘管研究對象分處歐洲、亞洲、美洲的不同國家，對於母體／母職的規訓卻是跨越國界的。

荷蘭的產後照顧服務政策享譽國際，卻被黃淑怡視為一種對母體的規訓。由政策推動背景觀之，荷蘭早期受西歐文化及酪農產業特性的影響，哺餵母乳風氣並不興盛。在「母乳是最好的（Breast Is Best）」運動全球化後，世界衛生組織要求會員國在

2025年前達到未滿六個月嬰幼兒50%親餵母乳的目標。循此脈絡，荷蘭政府所推動的產後照顧服務政策，即是以國家投入資源，在打著「促進嬰兒健康」的大旗下，透過強制健保的方式，介入私領域中個人是否及如何哺餵母乳的決定。於是，母體被化約為母乳的來源，而承載著強健荷蘭下一代的任務。

黃淑怡進一步批判道，規訓在於沒有選擇。不論個別女性的意願，當她們生產後，就必須打開家門，接受這套標準化的服務輸送。然而服務的內涵可能彈性不足、缺乏對多元文化的想像，而強行將荷蘭文化對母體的想像與照護標準套用到所有人身上。

在孩子出生後，對於母職的規訓可能變本加厲。黃宗儀以密集母職的概念來討論在韓國的臺灣媽媽所面臨的社會期待。密集母職指的是母親要為孩子付出一切，把育兒放在第一順位，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金錢投入孩子的教養。韓國社會本身對母職即存在高度期待，而外籍配偶更受到韓化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和規訓。

黃宗儀舉了許多生動的例子來說明臺妻在韓國教養小孩所承受的壓力。有受訪者希望小孩能學會中文，但由於韓國社會排外，只敢在家裡面教小

孩說中文，卻又被婆婆指責道：「媽媽韓文不好，所以女兒連韓語兒歌都不會唱。連最基本的韓國文化都不能教給小孩，妳算什麼韓國媽媽。」另一位受訪者則自承，自己在當媽媽前，並不注重穿著打扮；生了小孩後，卻必須穿戴名牌，努力將自己打扮為韓國中產階級的母親。因為她害怕若與眾不同，兒子會被孤立或霸凌。還有一位受訪者犀利地指出，韓國母職的神聖化程度趨近於將母親的角色妖魔化，讓她擔心一旦生小孩就要符合這個形象，所以她寧願不生小孩。

無獨有偶地，唐文慧也觀察到，在美國的臺灣媽媽們，仍然非常受限於傳統的、主流的、理想家庭的意識形態。唐文慧說，不能不承認這群媽媽有能動性，但也不能不承認，臺美移民體制中的父權結構依然非常穩固，深深影響著女性的跨國移動與家庭照顧安排。

未來葬送在這裡：生涯中斷的挫折與國族認同的矛盾

生活在他國，除了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擊外，研究者觀察到更多的是這些移民女性在父權架構下的挫折與矛盾。

這三篇研究中的移民女性大多是教育程度高、外貌出眾、具有專業技能或者經濟狀況佳的中產階級女性，因此

才具有在區域階層間向上流動的條件與資本。然而對於這樣的女性而言，職涯中斷的受挫感可能也會更加強烈。

例如黃宗儀提到，有一位受訪者長得非常漂亮，學歷還是留英的碩士，移民到韓國、生小孩後成為全職媽媽。每當她帶小孩去咖啡廳，總覺得被以不友善的眼光看待。她想像那些不友善的眼光將她視為「媽蟲」。媽蟲是韓國社會對全職主婦的歧視，指稱她們是丈夫的寄生蟲，每天無所事事、吃喝玩樂，吸乾丈夫的血。唐文慧的受訪者中，約有四分之三受訪時為全職主婦。這些人在臺灣可能是老師、律師等專業人士，但多數在孩子小的時候，選擇離職，成為專職主婦，並可能承受來自臺灣親人的壓力，質疑她們為何在美國當「煮飯婆」？雖然有的母親在孩子長大後再度回到職場，但很少從事與原來相同的工作，並且許多是兼職工作。

此外，這些移民女性也可能會產生國族認同的矛盾。例如黃宗儀指出，韓國社會是一個排外的社會，其中，中國人因為歷史因素而更受到排斥。因此，在韓國的臺灣媽媽若與小孩說中文，可能會被當作中國人，而面臨對外國人及對中國人的雙重歧視。這些媽媽大多有很強的自我反思能力，知道這樣的歧視其實是不對的，但仍然很難抵抗壓力，在公開場合和小孩說中文。

唐文慧也提到，在美國的臺裔媽媽常有種矛盾。她們為了追求「進步的」西方文化而帶著孩子移民美國；但當代美國主流社會推崇多元文化，希望移民可以保留並且積極展現自己的樣貌、不要被同化，為了扮演標準的亞裔移民「好媽媽」，也只好讓孩子學著表演「扇子舞」，來滿足白人中產階級主流社區的文化期待。

身為跨國能動主體：移民女性的生存之道

承上所述，移民女性在跨國的父權體制規訓下，遭遇許多挫折或矛盾，但是她們也發展出許多因應策略。例如黃淑怡的受訪者在面對產後照顧的文化衝擊時，應對的策略大致可分為嘗試、抵抗與折衷。黃淑怡並指出，這些跨國移民的母性主體，在接受產後照顧服務的規訓時，其實並非單純被動接受，而是具有一定程度能動性的。

黃宗儀的論文標題「硬著頭皮」，則很生動地呈現了在韓臺妻的生存之道。韓國人的集體性很強，從小在他人的眼光中長大，因此這些臺裔媽媽為了讓小孩融入韓國社會，即使韓文不好，也必須硬著頭皮與韓國社會打交道，時刻戰戰兢兢，生怕孩子沒能跟上他人的步調。黃宗儀形容她的受訪者，為了在競爭激烈的韓國社會生

存，大多非常強悍，且具有平權意識，因此她們採取的方式是不斷抗爭，例如不生小孩、拒絕母職，或者努力教育丈夫與夫家平權的概念。此外，她們也善用自身的優勢，例如原生家庭的經濟資本，或是高學歷、會中文的文化資本，藉此換取迴旋、協商的空間。即便無法完全翻轉韓國的密集母職，至少有機會稍做修正。

唐文慧則認為，在美臺裔媽媽的策略，總的來說就是跨國的混做母職。她們讓孩子維繫與臺灣的連帶，學中文、做臺灣料理、常讓孩子回臺灣；同時，她們也積極在美國當地社區維繫臺灣人網絡。在美國當地，已有很多發展得很成熟的臺灣人社團，例如：同鄉會、宗教團體、媽媽社團等等，提供臺灣移民豐富的資源，將移民流失的家屬網絡重新建造出來，形成一



個「擬似家庭」的網絡。並且唐文慧也觀察到，世代差異影響著臺灣媽媽們的母職實做。越年輕的世代，透過交通便利與網路科技的運用，其與臺灣的跨國連結越強，也更能運用臺灣原生家庭的各種資源來提升跨國移動的機會，豐富移民生活的內涵，呈現臺美混做的母職認同特徵。

結語

在論壇的尾聲，曾凡慈作結道，原本認為密集母職是非常西方中心的母職意識形態與實踐，然而從三篇跨國母職研究的論文中可以發現，研究者都使用或回應了密集母職的概念。由是觀之，密集母職並非僅在西方國家運作，而是在不同的國家體制下發展出相似卻又有所不同的型態。例如黃淑怡所觀察到的，在荷蘭是藉由國家力量及資源

的挹注，並在商業保險體制的協力下，強化對特定母體形象的想像及照護方式。或者是在黃宗儀的研究中，密集母職受東亞本身的國族階序所影響，而形成韓化的密集母職期待與實踐。從唐文慧的研究中，則可以看見密集母職如何在美國的移民體制、身份認同、家庭分工與族裔社群這四種體制下影響移民女性的行為與認同。

從這三篇研究可以發現，密集母職雖然是早在 1996 年就由社會學家 Sharon Hayes 提出的概念，但在現今越趨多元混雜的世界中，仍有可以繼續發展研究的潛力。本次的三篇研究，大多是從母性主體的個人經驗出發，談她們在密集母職規訓下的困頓與突破，然而更大的跨國運作的父權結構，是否以及如何有翻轉的可能，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繼續發展討論的方向。